

# 從抗衡走向中間

## ——馬英九的兩岸政策

● 王家英

自1990年代以來，影響台灣中央層級的選舉（尤其是總統選舉）最重要的政策議題無疑是兩岸關係。每次總統大選，與兩岸關係緊密相關的統獨議題，例必成為切割選民的最關鍵議題。

在2008年3月22日的台灣總統選舉中，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以760餘萬票大敗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的540餘萬票，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終結陳水扁領導下民進黨的八年執政，實現台灣二度「政黨輪替」，為台灣內部政治和兩岸關係創造新的變局。兩個月後的5月20日，馬英九以「人民奮起，台灣新生」為題，發表總統就職演說，為其未來四年的執政藍圖勾畫方向。本文旨在從議題競爭的角度，分析馬英九勝出總統選舉的關鍵原因及其兩岸政策對今後台灣內部政治和兩岸關係的主要影響。

### 一 台灣總統選舉競爭中的關鍵性議題

著名政治學者普沃斯基 (Adam Przeworski) 對現代民主政治曾作出如下簡潔的定義：「民主政治是一套政黨會輪掉選舉的制度」<sup>①</sup>。根據這一定義，馬英九擊敗執政黨候選人謝長

廷，實現台灣二度「政黨輪替」，代表的應不僅是他個人和國民黨的勝利，更應是台灣民主政治的進一步鞏固。「政黨輪替」逐漸走向常態化，很大程度上反映人民已超越意識形態的偏執，能夠透過定期的開放性選舉，理性地更換不孚眾望的政權。當候選人或政黨的上台或下台主要取決於其推出的政策（當然也包括政策的執行能力）能否贏得選民的信心和信任，而非其他非政策性的因素時，民主政治才能制度化。

自1990年代以來，影響台灣中央層級的選舉（尤其是總統選舉）最重要的政策議題無疑是兩岸關係。每次總統大選，與兩岸關係緊密相關的統獨議題，例必成為切割選民的最關鍵議題<sup>②</sup>，而台灣政治生態也因此一分为二，由分別代表統獨的兩股勢力——國民黨為首的「泛藍」陣營和民進黨為首的「泛綠」陣營——所長期支配。

兩岸關係之所以一直成為台灣總統大選的最關鍵議題，主要原因當然是中國大陸政府一再明確宣稱擁有對

台灣的主權、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自1980年代初以來持續堅持要以「一國兩制」的模式推動兩岸和平統一。由於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仍然相對封閉，實行威權管治，沒有台灣那麼自由開放；社會經濟水平也相較台灣落後，但其幅員、人口、總體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綜合國家力量等方面卻遠勝台灣，兩岸關係因此處於極為懸殊且充滿矛盾的權力不對稱 (power asymmetry) 之中。之所以造成矛盾，是因為這種極為懸殊的權力不對稱關係，使北京的對台政策始終傾向以盡量降低台灣的政治主權地位為目標，其堅持以香港和澳門為藍本的「一國兩制」政策統一台灣，可謂最佳的反映。然而，由於台灣政府和人民一直宣稱台灣或其所屬的中華民國為一主權獨立的國家，北京以降低台灣的政治主權地位為目標的對台政策無可避免地對台灣構成重大壓力，並在重要的選舉時刻備受選民的檢視和爭議。

## 二 在抗衡與順從之間： 台灣兩岸政策的選擇

根據政治學理論，在結構上，當力量弱小一方在面對力量強大一方的高壓或單邊主義政策時，一般而言，有兩種回應的策略，一是抗衡 (balancing)，另一是順從 (bandwagoning)。抗衡是指力量弱小一方藉着團結內部力量或透過聯盟外力的方式來抗拒力量強大一方的高壓政策；而順從則是指力量弱小一方單方面限制本身的行為，以避免與力量強大一方的核心利益互相衝突，從而維持彼此之間相對和緩的關係<sup>③</sup>。

面對中國因素，一直以來台灣社會內部對抗衡和順從的策略均出現不同的、數量龐大的擁護者，並成為其社會內部分化的一個極重要政治裂隙 (political cleavage)。簡單地說，由民進黨為首的「泛綠」陣營自然屬抗衡派，致力追求突破北京設定的、以統一為前提的「一個中國」原則，確立台灣與中國大陸是兩個互不從屬的主權國家；而與之競爭、以國民黨為首的「泛藍」陣營，則較多地屬於順從派，他們較強調在模糊化的「一個中國」原則下與北京妥協。

2000年的總統選舉，由於「泛藍」陣營分裂，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以不足四成選票擊敗國民黨候選人連戰和從國民黨分裂而出的獨立候選人宋楚瑜，成功當選總統，實現台灣歷史性的首度「政黨輪替」。陳水扁上台執政之初，儘管民進黨較傾向抗衡中國策略，但鑒於其少數總統和民進黨在立法院屬少數政府 (當時民進黨只擁有立法院約三分之一議席) 的地位，為了穩住台灣內部「泛藍」支持者不信任的情緒，以及減低北京和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對民進黨上台執政可能挑起兩岸衝突的戒心，他主動選擇較順從北京的兩岸政策，公開承諾「四不一沒有」，即「不會宣布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有關承諾其實就是對「台獨」的凍結。

然而，其後陳水扁為了種種原因<sup>④</sup>，逐漸背離其有關承諾，轉向日趨激烈的抗衡策略，推動「一邊一國」、「台灣正名」、「去中國化」、「防禦性公投」、終結「國統綱領」和「國統會」，甚至尋求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入聯公投」等活動，不斷衝擊北京「一個

陳水扁為了穩住台灣內部「泛藍」支持者不信任的情緒，以及減低北京和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對民進黨上台執政可能挑起兩岸衝突的戒心，他主動選擇較順從北京的兩岸政策，公開承諾「四不一沒有」，有關承諾其實就是對「台獨」的凍結。

由於謝長廷是執政黨的候選人，背負的執政包袱和意識形態包袱異常沉重，任何兩岸政策路線的調整都較易引起黨內黨外的質疑和批評，使得他的路線調整始終顯得左搖右擺。

中國」的原則底線。結果是兩岸關係迅速惡化<sup>⑤</sup>，而台灣也因此而付出沉重代價。

首先，在藍綠雙方欠缺互信的情況下，以少數政府推動「去中國化」、「去統化」等極具意識形態傾向的抗衡策略，只會加深藍綠之間的對抗，進一步撕裂台灣內部族群關係，造成嚴重的社會內耗。民進黨執政八年，朝野惡鬥持續不絕，國家機器空轉，各種大型社會政治動員此起彼落（如2004年的牽手護台灣運動、2006年的反貪腐倒扁運動），便是明證。

其次，兩岸持續對抗也使台灣經濟日益邊緣化。在抗衡中國策略的影響下，台商投資中國大陸成為台灣「國家安全」的威脅，受到各種限制，而可以大幅降低台商經營成本、有利台灣打造成為亞太營運中心、對台灣經濟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兩岸三通，更因兩岸協商遙遙無期而一拖再拖。即使是北京同意多種台灣農產品零關稅進口中國大陸，也被視為是對台灣農民的「統戰」而受到陳水扁政府消極以對。當中國被視為「敵國」，兩岸經貿關係無法全面開展，台灣自然難以充分利用近年中國經濟的急速崛起全力推動產業升級，布局全球。與此同時，兩岸關係的危機化和台灣經濟的邊緣化，也加速了資金的流走和台商根留中國大陸的決心。近年有不少台資企業寧可選擇在香港上市，也不選擇留在台灣，多少反映了此一趨勢。但如此一來，台灣的經濟尤其是金融業的持續收縮便無可避免地雪上加霜。

其三，不斷激進化的抗衡中國策略同時危及美台關係，原因是美國對台灣有安全承諾，兩岸關係危機加劇隨時有可能將美國捲入兩岸衝突之中。在這個過程中，由於推動抗衡策

略的陳水扁政府被美國視為製造麻煩的一方，損害美國利益，美國也因此而對陳水扁日趨不信任，近年甚至經常強烈批評陳水扁政府的相關行為。例如2003年底當陳水扁積極推動「防禦性公投」時，美國總統布殊 (George W. Bush) 便曾公開批評有關行動是試圖片面改變台海現狀，不符兩岸和美國利益<sup>⑥</sup>。又例如，在2007年9月，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柯慶生 (Thomas J. Christensen) 曾以極嚴厲的字眼，批評當時民進黨政府正在推動的「入聯公投」是正面衝撞北京紅線的挑釁行為，使那些可能支持台灣擴展國際空間的力量轉向。柯氏並認為，「入聯公投」的唯一效用是內部政治消費，也是為了短期政治利益而準備讓台灣人民冒着安全利益的風險<sup>⑦</sup>。當美台關係惡化，美國對陳水扁政府的不信任情緒升高，台灣的國際處境和安全問題必然承受極大壓力。

2008年3月22日舉行的台灣總統選舉，便是在上述陳水扁政府長期推動抗衡中國策略下，造成台灣社會和政治嚴重分裂內耗、兩岸關係對抗加劇、台灣經濟日趨邊緣化和美台關係大幅倒退等各種負面因素匯集、激盪，引發台灣民眾對台灣未來前景強烈焦慮而展開的。

對於台灣民眾的焦慮，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及其對手馬英九無疑都了然於胸，故此兩人的兩岸政策綱領均試圖從抗衡往順從的方向做出不同程度的調整，希望能藉此改善兩岸關係和美台關係，穩住台灣民心，贏得選票。然而，由於謝長廷是執政黨的候選人，背負的執政包袱和意識形態包袱異常沉重，任何兩岸政策路線的調整都較易引起黨內黨外的質疑和批評，使得他的路線調整始終顯得

左搖右擺、裏外不是人。例如，他高舉兩岸共生雙贏的旗幟，支持三通、包機直航，卻不敢完全拋棄陳水扁的「一邊一國」主張，更反對國民黨提出建立兩岸共同市場的構思，認為有關構思在政治上會變成中國併吞台灣的「一中市場」，在經濟上又會使大量台灣勞工面臨失業<sup>⑧</sup>。又例如，他曾主張以「憲法一中」作為描述兩岸現狀的最好方式，指台灣現行憲法裏面的「一中」就是中華民國，但面對「泛綠」民眾的壓力時，他又強調他當選總統後五年內要完成台灣「正名、制憲」<sup>⑨</sup>。

事實上，這種左搖右擺的兩岸政策路線不太可能消除台灣民眾對前景的焦慮，因為經歷了陳水扁政府八年抗衡中國策略所造成的種種負面效應之後，他們期待的是一次實質的、可信的，而非三心兩意的兩岸政策調整。就這一角度而言，馬英九在總統選舉中得票大幅拋離謝長廷200多萬票絕非偶然，而應視之為台灣民眾對馬英九和國民黨在政策理念和意識形態光譜上更能回應他們對兩岸政策訴求的信心。

當然，在競選過程中，馬英九和國民黨在兩岸政策上所面對的挑戰仍是頗為巨大的。簡單的說，如果台灣民眾對謝長廷的質疑，是他從抗衡轉向較為溫和的兩岸政策的真心，那麼他們對馬英九的憂慮則應是，他的兩岸政策調整幅度會否過大而使得台灣的獨立自主地位受到致命的傷害。畢竟，在台灣民眾眼中，國民黨從來是較傾向統一的順從派，而馬英九更具有外省族群背景，在台灣敏感複雜的族群政治中，這樣的身份所背負的包袱同樣也不輕。

分析馬英九選前選後一系列的兩岸政策主張，我們應不難明白台灣民

眾為何最終選擇他作為新總統，因為他所架構的兩岸政策藍圖並非從抗衡的一端擺向台灣民眾認為過於順從北京、傷害台灣獨立自主地位的另一端，而只是往中間落墨。馬氏選前一直強調，他將以《中華民國憲法》處理兩岸關係，而《中華民國憲法》就是「一中憲法」，在這意義上，他願意接受北京所堅持的「九二共識」，擱置爭議，恢復兩岸協商<sup>⑩</sup>；馬氏也承諾，他當選總統後將以「不統、不獨、不武」的原則處理兩岸關係，並在他任內不與北京商談統一問題<sup>⑪</sup>。換言之，馬氏並沒有以台灣的獨立自主地位換取兩岸和解，他只是從抗衡移向不統不獨的中間，避開兩岸不必要的主權攤牌，然後在這基礎上重建兩岸對話協商、和平發展的關係。

馬氏中間落墨的兩岸政策在他的總統就職演說中有全面而系統的論述，有關論述情理交融，結合了他個人的本土認同、台灣的國家定位、兩岸關係、國際空間，以及台美關係和外交關係等多個方面：

(一) 在本土認同上，馬氏十分感性地指出，他雖然不是在台灣出生，但台灣是他成長的故鄉，是他親人埋骨的所在。他還特別感念台灣社會對他這樣一個戰後新移民的包容之義、栽培之恩與擁抱之情，並承諾作為2,300萬人民付託的總統，他將義無反顧，別無懸念，勇往直前，全力以赴。

(二) 在國家定位上，馬氏強調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的時間只有三十八年，在台灣歲月卻將超過一甲子。在這將近六十年間，中華民國與台灣的命運已經緊緊結合在一起。

(三) 在兩岸關係上，馬氏重申將以最符合台灣主流民意的「不統、不獨、不武」的理念，在《中華民國憲

馬英九並沒有以台灣的獨立自主地位換取兩岸和解，他只是從抗衡移向不統不獨的中間，避開兩岸不必要的主權攤牌，然後在這基礎上重建兩岸對話協商、和平發展的關係。

法》架構下維持台灣海峽的現狀。「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他願意在這基礎上推動兩岸及早恢復協商，並秉持「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的原則，尋求共同利益的平衡點，而雙贏的起點是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的全面正常化。

(四) 在國際空間上，馬氏表明願意與北京就台灣的國際空間與兩岸和平協議進行協商，但他強調台灣需要安全、繁榮、尊嚴和不被孤立，因此，他呼籲兩岸不論在台灣海峽或國際社會，都應和解休兵，並在國際組織及活動中相互協助，彼此尊重。馬氏還意味深長地指出，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一定可以找到和平共榮之道，而兩岸問題最終解決的關鍵不在主權爭議，而在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故此他由衷期盼中國大陸繼續走向自由、民主與均富的大道，為兩岸關係的長遠和平發展，創造雙贏的歷史條件。

(五) 在台美關係和外交關係上，馬氏直接表明要強化與美國這位安全盟友及貿易夥伴的合作關係，並表示要珍惜邦交國的情誼和與所有理念相通的國家交流及擴大合作。但他不忘重申，新政府有防衛台灣安全的決心，並將編列合理的國防預算，採購必要的防衛性武器，以打造一支堅實的國防勁旅。

上述的兩岸關係論述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表面上馬英九是順從北京堅持的「九二共識」，強調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但這並不表示他接受兩岸向政治統一的方向前進，因為他是「一中各表」定義「九二共識」，而他所指的「一中」則是中華民國。關鍵是，在馬氏的論述中，「中華民國與台灣的命運已經緊緊結合在一起」，中華民國已經台灣化，而他雖是外省

總統，但亦已完全本土化，台灣對他有「包容之義、栽培之恩與擁抱之情」，是他「成長的故鄉」。換言之，馬氏接受「九二共識」並不代表真正順從北京，而是以一個模糊化、空洞化的概念穩住兩岸關係，換取北京擱置爭議、恢復兩岸協商，推動兩岸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的全面正常化。

事實上，在馬氏定義的「九二共識」下，台灣化的中華民國的獨立自主地位並沒有絲毫妥協，台灣將在「不統、不獨、不武」的原則下繼續不獨而獨，繼續尋求擴展國際空間、加強台美關係、發展邦交國，以及維持堅實的國防力量。這樣不統不獨、不獨而獨、中間落墨的兩岸政策，大體上是向1990年代初中階段李登輝主政下的兩岸政策回歸，唯一不同的是，當時李登輝的兩岸政策仍有國統會和國統綱領包裝，而今天馬英九的兩岸政策不但無意恢復陳水扁早已終止多時的國統會和國統綱領，而且他在當選後更公開表示在他有生之年不會看見兩岸統一<sup>⑫</sup>。顯而易見，馬氏追求的兩岸政策雖較陳水扁時代的抗衡策略有所調整，但主要在於對台灣國家地位的論述<sup>⑬</sup>，而非對台灣獨立自主地位的放棄。

### 三 兩岸政策中間化對台灣內部政治與兩岸關係的影響

可以預期，上述馬英九的兩岸政策應會為台灣內部政治和兩岸關係帶來多方面的深遠影響。在台灣內部政治上：

(一) 有關政策的推動和落實，將無可避免地會對落敗在野的民進黨構成重大壓力，迫使它重新思考建構其

馬英九接受「九二共識」並不代表真正順從北京，而是以一個模糊化、空洞化的概念穩住兩岸關係，換取北京擱置爭議、恢復兩岸協商，推動兩岸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的全面正常化。

兩岸政策的論述，否則它極可能面對被民意長期邊緣化的命運，捲土重來的機會愈趨渺茫。事實上，新當選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競選黨主席時便曾一再表示，民進黨將會重整其中國論述<sup>⑭</sup>。就這一角度看，在競爭壓力下，國、民兩黨原來對立分歧的兩岸政策應會愈來愈趨於接近，尤其是當像馬英九這樣具有外省背景的政治菁英都能夠提出頗具創意的、以台灣化的中華民國定義「九二共識」的主張，避開兩岸主權攤牌，很難想像已淪為在野的民進黨會長期受制於意識形態偏執，無法得出可與國民黨互別苗頭的新兩岸政策論述。當然，在這個過程中，藍綠兩大陣營內部和彼此之間仍難免出現各種各樣的爭議和矛盾，但經歷過去八年的內外制約與慘痛教訓，兩岸政策的中間化和務實化應是台灣政治發展的大勢所趨。

(二) 隨着台灣朝野的兩岸政策日趨中間化和務實化，其政黨政治應可逐步走出惡性對抗的困局，並朝向更多的理性政策競爭和制度實踐，民主政治應會得到進一步鞏固。馬英九在其總統就職演說中便特別強調，新政府要樹立廉能政府的新典範，嚴格要求官員的清廉與效能；另一方面，他也認為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遵憲與行憲比修憲更重要，而他作為總統，將以身作則，嚴守憲政分際，真正落實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做到政府全面依法行政，行政院依法對立法院負責，司法機關落實法治人權，考試院健全文官體制，監察院糾彈違法失職。馬氏的講話，多少揭示了他深刻洞察台灣民眾對陳水扁時代貪腐醜聞不絕和朝野惡性對抗愈演愈烈的深惡痛絕，並展現帶領台灣重建廉政與法治作為民主政治基石的決心。值得注

意的是，剛淪為在野的民進黨同樣透露出相似的醒覺，黨主席蔡英文在一個黨內活動場合便呼籲黨員，對新政府缺失的批判必須理性，要以國家利益立場為人民把關<sup>⑮</sup>。經過八年跌跌撞撞的實踐之後，台灣的民主政治和政黨政治在人民的監督下，似乎已找到理性發展的方向。

至於兩岸關係，馬英九的新兩岸政策帶來的影響更將是複雜多變，機會與挑戰兼而有之：

(一) 台灣新政府願意回歸「九二共識」無疑是北京所樂見，亦因為如此，北京才會順應馬英九的呼籲，在他上台後不久即迅速恢復海基會和海協會的談判協商，並順利地就兩岸周末包機直航和中國大陸居民赴台旅遊達成協議，讓馬英九可以向台灣選民有所交代<sup>⑯</sup>。由於北京亟欲利用兩岸政策相對溫和的國民黨上台執政的契機，重新將兩岸關係導向良性互動的方向，而馬英九和國民黨也十分希望利用持續崛起的中國大陸經濟重新點燃台灣的經濟引擎，扭轉邊緣化的趨勢，這種相互配合的考慮應可推動未來兩岸經貿互動和民間往來進一步取得成就，兩岸全面直航、開放中國大陸資金赴台投資等政策措施，應可逐步得到實現。

(二) 然而，在政治層面，儘管馬英九承諾以「不統、不獨、不武」的原則，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維持兩岸關係的現狀，但如前所指，他所強調的中華民國是台灣化的中華民國，這反映台灣民眾的國家視野已非兩岸統一，而是台灣的獨立自主，連馬英九這樣具外省背景的政治菁英也不例外。隨着世代交替和本土化的持續，不難想像中華民國的台灣化只會更形突出，只要外在客觀形勢稍有變

隨着世代交替和本土化的持續，中華民國的台灣化只會更形突出，只要外在客觀形勢稍有變化，「正名、修憲」的訴求難免重趨熱熾，對台灣內部政治和兩岸關係帶來新的壓力。

當北京看見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最終只是美台關係制約下的長期非統化和台灣民主政治實踐帶動下台灣民眾國家意識的持續台灣化，她能否容忍？如不能容忍，會採取甚麼行動反制？

化，「正名、修憲」的訴求難免重趨熱熾，對台灣內部政治和兩岸關係帶來新的壓力。不過，另一方面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兩岸經貿互動和民間往來在模糊化的「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逐步走向正常化、緊密化和頻繁化，勢必加深台灣對中國大陸的經濟依賴，而兩岸的經貿整合也會增加北京促統的籌碼和平衡台灣民眾國家意識台灣化的發展。換言之，未來兩岸關係發展，仍將受制於中華民國的台灣化和兩岸經貿的整合這兩股力量的相互拉扯而迭有起伏，若兩股力量的消長出現嚴重失衡情況，將會對兩岸關係的平穩發展帶來變數。

(三) 若將未來兩岸發展拉闊至國際層面觀察，其面對的變數同樣不小，原因是馬英九所接受的「九二共識」，是以台灣化的中華民國對應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並呼籲北京尊重和協助台灣參與國際空間。這樣的策略和訴求遲早會迫使北京面對兩難局面：若對台灣爭取國際參與做出一如以往的打壓，必然引發台灣社會新的反彈，使兩岸關係剛出現的和緩及正面氣氛隨時逆轉；若放任台灣以國家或其他名義參與國際社會，極可能讓台灣取得更多的國際政治資本，向獨立的方向邁進。事實上，北京面對的這種兩難局面在馬英九就職總統不久已隨即顯露：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5月底會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時曾友善地表示，北京了解台灣民眾有關參與國際活動問題的感受，兩岸恢復協商後，北京願意討論有關問題，包括優先討論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的問題<sup>①</sup>；但約一個月後，新任國台辦主任王毅接受日本共同社訪問時指出，北京不接受台灣正式加入世界衛生組織<sup>②</sup>。從北京這種進退兩難的情況推測，台灣的國際參與以至馬英

九表明必然會珍惜的邦交關係和擴展的國際合作，都難免繼續困擾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絕不容易做到原來兩岸雙方對於擱置爭議的期待。

(四) 同樣在國際層面，北京在未來兩岸關係發展上所面對的另一複雜挑戰，應是馬英九在其總統就職演說中直接表明要強化與美國的軍事與經濟合作關係，以及與理念相通的國家擴大交流合作。毫無疑問，馬英九處理兩岸關係的戰略構思固然是以回歸模糊化的「九二共識」、促成兩岸和解及和平發展做開端，但有關的和解及和平發展卻是以重建和加強台美關係為框架，擴大國際聯繫為平衡。在這一戰略構思下，兩岸關係的發展只會朝非統化的方向發展，因為兩岸統一絕不符合美國及其盟友(包括日本)的利益。就這一點而言，前述馬英九一再承諾在他任內不與北京協商統一問題，其對象應不僅是台灣民眾，也應同時是美國及其盟友。無論如何，當北京看見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最終只是美台關係制約下的長期非統化和台灣民主政治實踐帶動下台灣民眾國家意識的持續台灣化，她能否容忍？如果不能容忍，又會採取甚麼行動反制？北京對這些問題的不同判斷和反應，將無可避免地影響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進程。

## 四 結論

總括而言，馬英九中間落墨的兩岸政策是台灣選民理性選擇的結果，背後反映的是台灣民主政治的漸趨成熟與鞏固。理性選擇是因為台灣民眾已超越意識形態的偏執，清楚意識到繼續抗衡中國的策略只會讓兩岸關係愈趨惡化，並加劇台灣內部對立內耗、

經濟邊緣化和台美關係受壓等多重惡果，而選擇一個中間落墨的兩岸政策則有助兩岸和解及和平發展，讓台灣從其他相關問題中脫困，重新上路。

但中間落墨的兩岸政策只是台灣民眾盱衡台灣內外形勢後的一種妥協性選擇，有其內在的局限：由於有關政策是以回歸模糊化的「九二共識」避開兩岸主權攤牌，強調的是「不統、不獨、不武」的負面列表，並以台灣化的中華民國對應北京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和透過台美關係的加強與國際空間的爭取來平衡北京的政治（促統）壓力，因此可以預期，未來兩岸關係發展仍將是緩慢漸進的，而且主要集中於經貿和民間層面，政治方面的發展則會繼續受到台灣對兩岸統一興趣的缺乏、對中華民國台灣化的堅持、對加強國際參與和台美關係的重視等多重因素的制約而不易有所突破，甚至可能因雙方某些誤判而出現新的爭議，進而倒過來影響兩岸經貿和民間層面的發展。

畢竟，在現實的兩岸政治中，迴避統獨爭議說來容易，但要實踐起來卻難免舉步維艱，因為兩岸關係的權力結構強弱懸殊，雙方各有自己的政治議程，而且互信極度不足，加上牽涉複雜的國際利益，缺乏雙方信賴的強而有力的國際仲裁者，因此要做到彼此克制、互不猜忌，絕對是高難度的政治智慧的考驗。

#### 註釋

①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

② Sheng Lijun, *China and Taiwan: Cross-Strait Relations under Chen Shui-bia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③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吳玉山：《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從前蘇聯看台灣與大陸間的關係》（台北：正中書局，1997），頁18-19。

④ 有關原因包括：(1)意識形態上民進黨以獨立建國為目標，抗衡中國策略既有其意識形態的正當性，而且有助安撫深綠民眾的訴求；(2)藉挑起兩岸對抗營造內部同仇敵愾，邊緣化「泛藍」陣營；(3)兩岸對抗又可轉移社會視線，減低民進黨上台執政表現乏善可陳甚至是貪腐醜聞不絕的壓力；(4)抗衡中國的「去中國化」和「本土化」等活動同時可深化台灣社會的本土意識，擴大民進黨的社會基礎。

⑤ 例如，2005年3月北京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對台灣的抗衡策略作出反制，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⑥ 《自由時報》，2003年12月3日。

⑦ 《自由時報》，2007年9月13日。

⑧ 《自由時報》，2008年2月28日。

⑨ 《自由時報》，2007年8月1日。

⑩ 《經濟日報》（台北），2008年1月24日。

⑪ 中央通訊社，2007年11月22日，[www.haixiainfo.com.tw/archive/2007-11-22.html](http://www.haixiainfo.com.tw/archive/2007-11-22.html)。

⑫ 《自由時報》，2008年5月16日。馬英九在接受美聯社專訪時作上述表示。

⑬ 陳水扁追求台灣作為獨立國家的法理化，而馬英九則強調中華民國的台灣化。

⑭ 《自由時報》，2008年4月19日。

⑮ 中央通訊社，2008年6月28日，<http://news.yam.com/cna/politics/200806/20080628245921.html>。

⑯ 《中國時報》，2008年6月14日。

⑰ 《中國時報》，2008年6月2日。

⑱ 《中國時報》，2008年6月26日。

兩岸關係的權力結構強弱懸殊，雙方各有自己的政治議程，而且互信極度不足，加上牽涉複雜的國際利益，缺乏雙方信賴的強而有力的國際仲裁者，因此要做到彼此克制、互不猜忌，絕對是高難度的政治智慧的考驗。